

## 山西票号如何对付“老赖”

山西财经大学 张亚兰

最近,关于失信的话题屡屡吸引人们的眼球。其实,不论在哪个时代,都不乏欠债不还的“老赖”身影出现。面对危及票号生存的“老赖”,山西票号会如何应对?其招数的威力与效力如何?对当代久治不愈的“老赖”难题,有何可供借鉴的妙策良方?下面我们通过一则史料了解一下山西票号当年是怎样与“老赖”斗智斗勇的。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同治十年夏,山西票号将其在成都承汇的,汇往云贵两省的协饷银 14 万两,暂时借给了当地殷实大客户——赵姓四大盐号。约定在当年 9、10、11 月分期归还,以便汇付云贵两省协饷。岂料 8、9 月份,四盐号一齐倒塌。山西票号认为四盐号是“蓄意席卷,伙党鲸吞,将所收现银各处遁藏,暗运回陕,寄存己铺店之内”(史料载赵姓为陕西渭南县人,在陕西有当铺、商店 20 余座。在四川开有四大盐号,有井灶锅厂数十处,仅厂房院落就值百八十万)。山西票号随将四盐号告至其所在的成都、华阴、巴县三县官府,希望官府“严限追缴”。没想到四盐号一方面在制军盐道处打通关系,另一方面鼓动壮丁、游民聚众滋事。迫于盐号压力,官府批示“自行央缓”;山西票号也暂避其锋芒,同意缓期。

一年过去了,该四号“依势抗限,任催不理”。山西票号查得该四号“堆积之盐,早已畅销,两厂锅灶照常熬煎,川楚运售毫无阻滞,而票号欠款分厘不还”;又查得该四号东主亲戚,俱是官绅,预谋犍为县委员一职。其亲戚在“制军盐道处”活动关系,称该四盐号为“代商行运官号”(官府运盐的代理商号),企图“永不还账”;且该号东家的儿子赵席珍已经用捐骗的官饷捐得“同知”一衔,已被指发四川,现在成都候补。

这四号“毫无忌惮”“抗官拒债”的恶劣影响不止于此。“自赵四号有力抗债以来,省(成都,四川省府)渝(重庆)二处纷纷效尤,相率倒塌 22 处,又倒累我帮银 20 余万两”。面对如此“势大弥天”“凶横莫当”的“老赖”,“守份循理”的山西票号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了。

山西票帮重庆汇兑庄集议分析情势如下:1.“川省盐务字号众多,皆称代商官号,合帮往来,汇借不下百十余万。盐商行号权势巨大,只可暂为截止交易。往后省、渝二城所交盐务字号汇票借项(指先由票号垫借款项汇往外地的汇款业务。山西票号集汇兑与存放款业务于一身,能在收付款时间、金额、地点上灵活安排,是众多商号倚重的金融机构),尽数收索,分文不交;即便交情至厚者,亦不得徇私”。2.“至于领汇协饷,川省通年收交亦有数百万两”。各盐号纷纷效仿倒累,至票号“现银赔垫累甚,以至挪借无门,碍难周转,力量多有不及,生理将不能做。若仍照前领汇协饷,设或届期措办不及,必致贻误军需,实难认此重咎,只可预禀辞退停止不汇”。并称“此皆由赵四号抗债凶恶、坑骗威逼,阻盐务断绝交易,致军饷不能汇兑,我帮不得已之举,高明者谅可见原也。”最后总结教训说“伏思我帮被此坑欠欺蒙,而又无策筹济,若不丕整旧规,认真办理,将来亦效赵字号倒累他人耳。”于是,公同议定“自本年年终为止,所有犍富两厂盐务字号,往后一概不交,川省官饷协饷,一概不汇,以保血本。此系合帮共同情愿,各无异说,如有阳奉阴违者,查出议罚,勿致后悔”。

又约定在中秋之前,各票号在帮首字号集结,带上自己的图章(指在公司议定书上盖章),共同包程(共同分担派专人前往晋、京老号商议的往返路费),驰商晋、京老号。

随后收到晋、京号来信:“查得赵字四号,关设犍富两厂百八十年,川陕产业、铺典甚多,生意并无赔累。赵东著名巨富,乃财广势大,恃豪穷债。伊但见川江峡裹天日,胆敢坑饷,捐官

指分四川，藐无法纪，横行舞弊，目下只可暂避其降，容图后举。即照重庆我帮公议章程，速将议单刊刻，转发各省各庄各号诸翁，统希遵守施行，分派各号悬挂，俾各省上宪、商号，咸知我帮停汇川协饷之苦衷，不交盐务之缘由，为官民所共鉴也。”

由史料信息推测，这份“重庆汇兑庄公议新章”即为当年刊刻多份，在全国各票号分号张贴公示的内容。或许正因为如此，才能留存至今。对外公示的信息既说明了事情的原委，也让我们了解了山西票号应对“老赖”的策略：1.停止对所有键富两厂盐务字号的汇兑融资业务，间接对盐商行号施加压力（盐商行号汇借不下百十余万两），进而促使盐商行号利用行规对赵姓四号做出惩罚，从行会内部对其施加还款压力。在当时的社会，行会力量十分强大，决定着行业生存发展的大事小情。如果某字号遭受行会惩罚，就意味着“最为严厉的隔离”，甚至会因此“丧失社会和商业上的地位”。这种惩罚的威力要远远大于政府的惩罚。2.停汇川省协饷，对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赵姓四字号利用官府势力拒还债款，山西票号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停汇官饷，直接影响四川省府官员的乌纱帽，其威力比赵姓四号靠鼓动个别灶丁闹事，威胁影响该县的地方税收来得要大得多。川省官款汇兑年约数百万两，汇兑之时，往往不一定能备齐银两，时常需要票号借垫。山西票号停汇官款，无疑抓住了官府的“痛点”，有立竿见影之效。山西票号不仅垄断了川省对京城及全国各省份的京饷、军饷、协饷的汇兑，还垄断了各省汇兑捐纳官职的款项，并转发文凭、执照等事，且与在京及各省官员关系密切，因此停汇一事不仅不会对票号有不利影响，反而能让更多的官员为票号说话，增强票号在政府方面的影响力。3.统一行动，广为告知。据史料记载，1875年（光绪元年）才有云南李姓商人在成都、重庆开设天顺祥票号，在此之前，仅有晋商开设的多家票号在川省为政府和大商号提供汇兑融资的金融服务；就全国而言，山西票号处于金融领域的最上层，掌控着全国各地的票号分支机构，业内无人匹敌。由此可见，川省和全国山西票号的统一行动，对赵姓“老赖”的威慑和打击力度是相当大的。同时，山西票号在全国各地广为告知，信息充分透明、处理措施合情合理，能赢得社会各界的同情和认同，在舆论优势上是赵姓四字号难以企及的。

由于资料缺乏，我们目前没有发现后续发展的相关史料，但是分析票号应对“老赖”的办法，可谓“刀刀见血”“事事在理”，而票号汇兑庄团结应对、全国山西票号集体响应的群体力量，更是令社会各界不可小觑。事实上，在那个年代，所有工商业的字号和从业人员都加入了大大小小的行会，行会的公正透明、威力和执行力受到社会广泛认可，也是政府社会管理的重要支柱。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社会中间层的组织力量存在，很多纠纷可以在不同级别的同业内部迅速解决，既实现了“多重博弈”，又节约了政府及社会的资源，甚至对法律的依赖都不是很强。我们现在“老赖”层出不穷，又无力治理的现状，其实与缺少最具执行力的“社会中间层”的行业自律管理有很大关系。所有的纠纷都诉诸法律，社会资源严重不均，难免出现法律执行力不足，甚至有大量通过行贿受贿逃避法律制裁的“老赖”存在。

社会本身的多层次性，需要与之匹配的多层制度约束，从山西票号应对“老赖”的策略中，我们发现了当今社会的某些薄弱之处，历史研究的意义或在于此吧。